



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D231/7



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

(1919—1949)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研究部

一九八二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倪进云

封面设计：李文金

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19--1949)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6 插页 9 字数 315 千

1982年12月 第一版 1982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1,000册

书号： 11118·97

定价： 1.37元

0441

50586

目 录

五四运动·····	(1)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0)
香港海员大罢工·····	(25)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31)
开滦五矿工人罢工·····	(37)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42)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49)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5)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61)
五卅运动·····	(67)
省港大罢工·····	(74)
海丰农民运动·····	(80)
农民运动讲习所·····	(85)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93)
首都革命和“三·一八”惨案·····	(98)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105)

北伐战争·····	(112)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18)
湖南农民运动·····	(124)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3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40)
南昌起义·····	(145)
八七会议·····	(151)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57)
广州起义·····	(164)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	(16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80)
古田会议·····	(187)
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198)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203)
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	(211)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219)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226)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233)
陕甘革命根据地·····	(241)
琼崖革命根据地·····	(246)
“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救亡运动·····	(252)
红军反“围剿”战争·····	(257)
长征·····	(264)

遵义会议·····	(271)
“一二·九”运动·····	(278)
瓦窑堡会议·····	(284)
西安事变·····	(289)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96)
苏区的土地革命·····	(304)
反文化“围剿”·····	(312)
党在白区的斗争·····	(321)
芦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30)
洛川会议·····	(335)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340)
华北抗日根据地·····	(344)
华中抗日根据地·····	(351)
华南抗日根据地·····	(358)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363)
皖南事变·····	(370)
百团大战·····	(375)
整风运动·····	(380)
大生产运动·····	(385)
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	(390)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01)
重庆谈判·····	(406)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	(412)
“一二·一”运动·····	(417)

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423)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431)
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	(438)
新式整军运动·····	(446)
· 国统区人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452)
“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457)
辽沈战役·····	(463)
淮海战役·····	(469)
平津战役·····	(474)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479)
渡江战役·····	(485)
全国大陆的解放·····	(49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497)

附：

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路线示意图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井冈山会师示意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示意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战略决战示意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示意图

五 四 运 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新起点。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政权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手中，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广大人民依然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趁英、法、俄、德等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武装侵占了原为德国“势力范围”的我国山东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又乘袁世凯急欲称帝之机，诱迫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由于人民的反对，实际上未能实现）。与此同时，由于其他帝国主义都忙于战争，使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空隙中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工人的数量相应增长，工人斗争的规模随之扩大。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不满于现状，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出发，纷纷努力

探求国家、民族新的出路，对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日益迫切。

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二卷一期起更名《新青年》）创刊号出版，发表了陈独秀写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首先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接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人，都相继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文艺作品，大力宣传科学与民主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提倡白话文学，介绍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呐喊，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进一步激起了他们追求真理的迫切愿望，从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伟大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流，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世界革命高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

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赞成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新青年》及《每周评论》等刊物，也陆续发表和译载了一些歌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工人运动的文章。“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爆发的。它的直接导火线是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所谓的“和平会议”。它实际上是一次分赃的会议。中国军阀政府在日、美两国的鼓动下，1917年也参加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因此也以“战胜国”资格派代表出席和会。全国人民乘此时机，督促政府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等正当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竟置之不理；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却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久已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反帝怒火，象火山一样的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约三千人，按照事先约定，陆续到天安门前集合。他们手持写有“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等字样的白布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

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政府示威，要求惩办当时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袁世凯政府时的外交次长，“二十一条”的签字者）、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是将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签字者，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和陆宗輿（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学生队伍齐集后，即开始游行，向使馆区东交民巷进发，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各国使馆促使他们的政府改变在“巴黎和会”上所作的牺牲中国权益的决定。但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竟为外国卫队所阻。队伍伫立街头达两小时左右，学生们派出代表再三交涉，终未能通过。这就更加激起了游行学生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愤恨，游行队伍遂改道，经过东单，直奔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向三个卖国贼兴问罪之师。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群众观之落泪，不少人自动加入游行队伍，甚至巡警也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游行队伍抵达曹宅墙外，许多人即将写有标语的旗帜抛入墙内。其中早有准备的几名学生，不顾武装卫兵的威胁，奋勇地越墙打开铁门，群众随之涌而入。曹汝霖闻讯躲藏起来，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被义愤填膺的学生们痛打了一顿。曹宅也为学生们放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人心大快。

北京军阀政府出动军警，当场捕去学生三十二人，并扬言要交付法庭审判。为了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营救被捕同学，5月5日，北京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相约全体罢课，并开会决议，上书请杀曹、陆以谢国人。接着，许多中

学学生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他们发通电，撒传单，到街头讲演，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同学，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7日，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学生们开始复课。但由于反动政府对学生们提出的其他爱国正义要求拒绝答复，并查封了学联刊物《五七日刊》，禁止学生集会、游行示威；逼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继续逮捕爱国学生，这又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学生联合会决定：从5月19日起，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再次举行联合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护鲁义勇队，继续进行斗争。5月26日，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自6月3日起，恢复街头讲演，如遭逮捕，次日将以更大的声势还击。

6月3日上午，当北京学生约两千人分赴街头讲演时，又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被捕者近二百人。翌日，出发讲演的学生增加一倍，但又有七百人被捕。北京大学竟成了军阀政府设立的“临时监狱”。

在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5月7日，天津、济南的学生都举行了游行示威；26日，上海学生举行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甚至一些乡村的人民群众，以及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都纷纷行动起来，抗议军阀政府的暴行。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为青年学生投入运动作了思想的发动；在他发起

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等进步团体，为运动的开展作了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运动爆发以后，他又经常和进步青年一起讨论形势，研究策略，及时地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政治主张。^①陈独秀也积极撰写文章，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和“平民征服政府”两大政治主张，^②并上街宣传。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也分别在长沙、天津、武汉等地积极参加和指导了这些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

尽管北京反动军阀政府当时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采取了各种镇压和分化瓦解的手段，但是，爱国青年们并没有屈服，数十万青年学生，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当6月3日、4日北京学生遭到反动政府大规模镇压逮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也立即投入了斗争。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10日，罢工达到高潮，参加的工人共达六、七万，整个上海的工业生产陷于瘫痪，对外水陆交通断绝。与此同时，商人罢市，商业大部停顿，给予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①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② 《山东问题与国民之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随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多个城市。长辛店和唐山的铁路工人,天津的人力车工人,以及杭州、九江、长沙、武汉、济南、青岛等地的工人,也相继纷纷举行罢工、游行示威或其他各种爱国活动。这样,“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就进一步发展成为有广大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极其广泛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工人阶级则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6月6、7两日,北京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学生;10日,撤销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进一步发展成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工作。

历史的事实证明:五四运动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它成为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政治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同时,它又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它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

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李子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随着军阀黑暗统治的加强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其目的在于向西方寻找国家、民族及个人的出路。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把这一运动推向空前的高潮。一批批有志青年，告别风雨飘摇的祖国，纷纷束装西去，期望通过勤工俭学的途径，实现他们“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读救国”的理想。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在到达法国之后，边读书，边同法国工人一道劳动，从而逐步学习到一些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开始摆脱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而选定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涌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诞生，正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积极成果的表现。

勤工俭学缘起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旅欧教育运动。早在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吴玉章等人即在

北京、四川等地发起过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兴勤俭乐学之风”，“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借以改良中国社会。1915年他们又在法国组织起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的勤工俭学会；他们还在巴黎豆腐公司、第厄普人造丝厂的少量华工中实行工余求学，并开办华工夜校。1916年中法两国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以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它实际上成了负责主持华工教育、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的总机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赴法俭学的不足百人，而实行勤工俭学的则基本上只限于一些旅法华工。1917年旅欧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们，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法，拟扩展华工教育，并借此倡导贫苦青年学生用半工半读的方法赴法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遂积极在国内恢复俭学会活动，设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在河北蠡县布里村、保定、北京、长辛店、成都、重庆、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建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或预备班。由于发起者们的组织和提倡，加之法国战后不久劳动力严重缺乏，急需从国外补充，这就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大批受过中等教育，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愿望，而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的青年，得知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而达到升学的目的之后，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召唤着他们；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的法兰西共和国也吸引着他们。但在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分，在认识上并不明确，思想中还混合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

主义等各种成份。他们共同的主导思想则是：为了救国、改造社会和求得自身的解放。故时人誉之为“探险远征队”。

1919年3月17日，首批中国勤工俭学生乘日轮因幡丸号自上海启碇西去，至1921年1月20日最末一批乘法轮智利号抵达马赛，前后共二十批计一千六百余人先后到达法国。其中以四川、湖南两省为最多，均在三百人以上。这些勤工俭学学生大部分都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也有少数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年龄最大的有：湖南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徐特立、贵州的黄齐生；年龄小的还不足十五岁，如河北的王树堂就只有十岁。还有一批女生如向警予、蔡畅、郭隆真、刘清扬等约四十余人。从文化程度看，以中学生最多，也有小学、师范、大专院校的学生、留日学生、教师、工人、农场工作者、商人、各业职员、医生、记者及南洋等地的华侨师生等。到法国后，他们有的入学校，有的进工厂。入学的多就读于枫丹白露、蒙塔尔纪、沙多居里、圣日耳曼、默伦、暮岚等公学；进厂的大多分布在圣太田、勒阿弗尔、圣夏门等处；也有到矿山、农场做工的。但多半是做粗工或学徒工。一般来说，所得工资极微，日工资约十法郎左右。生活更是无定，“时而学生，时而工人”。即便如此，在巴黎西郊戈隆勃的华侨协社布篷、地下室里，也还经常居住着一批候工者，每日仅靠从华法教育会领取五法郎维持费过活。这些勤工俭学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生活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自豪地说：“从素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中间出来的学